

全注 全译

史記

上册



全注
全譯

史記

上冊

天津古籍出版社

注 译 人 员

(按注译篇目为序)

- 刘起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尚书评述》、《尚书学史》、《尚书源流及传本考》、《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古史续辨》、《顾颉刚先生学述》、《刘起钊经学论集》等书。
- 林小安 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殷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武乙文丁卜辞补证》、《殷墟卜辞𠄎字考辨》、《𠄎字考释》、《𠄎字考辨》、《“韦编三绝”正读》、《中国文字起源之我见》等论文。
- 裘锡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字学概要》、《古文字论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等书。
- 李 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获北京大学首届青年优秀成果奖)、《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吴孙子发微》、《中国方术学》等,并译有《中国古代房内考》,主编《中国兵书名著今译》、《中国方术概观》。
- 吴树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秦汉文献研究》、《风俗通义校释》、《东观汉记校注》、《二十四史简介》、《黄石公三略译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合著)、《汉英对照论语今译》(合著)等书。整理出版《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等十余种古籍。编有多种工具书。
- 吕宗力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博士生,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著有《中国民间诸神》(合著)等书。
- 王煦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邀研究员,撰有《公孙龙指物论诠释》、《目录学研究对象商榷》、《统治阶级道德继承问题》等论文。
- 李解民 中华书局副编审,著有《尉繚子注译》、《白话续资治通鉴》(合著)、《文白对照续资治通鉴》(合著)、《白话资治通鉴》(合著)、《文白对照资治通鉴》(合

- 著)、《白话二十五史精选》(合著)、《兵家宝鉴》(合著)等书,撰有《开阡陌辨正》、《云梦秦简所载魏律研究》、《刘氏书录研究》等十几篇论文,点校《簷曝杂记》、《竹叶亭杂记》、《春秋左传诂》、《春秋大事表》等多部古籍。
- 缪文远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战国策考辨》、《战国策新释》、《七国考订补》等书。
- 骈宇騫 中华书局副编审,著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一书,撰有《银雀山竹简〈王兵〉篇研究》、《帛书〈春秋事语〉初探》等论文。整理《历代刑法考》、《谷梁补注》、《问字堂集》、《旧京琐记》等古籍。
- 盛冬铃 中华书局副编审,著有《六韬注译》、《那兰性德词选》等书,撰有《西周铜器铭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清初第一词人那兰性德》等论文,整理《松窗梦语》、《治世余闻》、《继世纪闻》等古籍。
- 赵 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著有《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华夏衣冠五千年》、《唐代墓志汇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等书。
- 王文锦 中华书局编审,校点整理《通典》、《周礼正义》等古籍。
- 阴法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等书,撰有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文化史的论文多篇,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一书,与人合作点校《隋书》。
- 陈久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彝族天文学史》、《天文学简史》、《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中国节庆及其起源》、《陈久金集》。校点《中国方术概观》中《式法卷》、《星命卷》。
- 魏嵩山 复旦大学副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与人合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撰有《太湖流域开发探源》、《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等论文。
- 蒋非非 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撰有《算赋制度问题探讨》、《秦汉移民实边政策简论》等论文。
- 魏连科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撰有《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天祥家书诗帖考释》、《顾炎武北方交游考》等论文三十余篇。整理《弁山堂别集》、《玉堂丛语》、《典故纪闻》、《三垣笔记》等多种古籍。
- 顾 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编审,编有《顾颉刚读书笔记》,撰有《试论“三年丧”起源》等论文。
- 陈绍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撰有《百越与匈奴衣食住行之比较研究》、《试论王莽改币》、《汉唐长安规划比较之我见》等论文。
- 王瑞来 中华书局编辑,撰有《岳珂生平事迹考述》等论文,点校《鹤林玉露》、《宋宰辅年表校补》等古籍。

- 谢孝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撰有《略论河东文化与中国文明》、《读王森然先生〈夏后氏大禹评传〉兼论中国古代文明》、《日本佚存汉籍考述》、《盐铁论校注小议》。
- 陈 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与人合著《商周古文字读本》,编有《永乐大典古方志辑佚》、《全唐诗索引》(合编),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今文尚书考证》、《订讹类编》等,曾参加《辞源》修订及《汉语大词典》第一卷编写工作。
- 胡平生 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阜阳汉简诗经研究》、《孝经评述》、《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等书,撰有《阜阳汉简苍颉篇的初步研究》、《阜阳汉简年表整理札记》、《敦煌马圈湾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辨证》、《木简券书制度考》等论文。
- 何法周 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韩愈新论》、《侯方域集校笺》(与人合著)、《唐文选》(与人共同主编)、《李贺诗选》(与人合著)等书。
- 李祖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审,与人合著《中国古代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主编《中国古代改革家》、《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传》、《中国古代军制史》、《孙子研究新论》等书。
- 马 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编有《秦汉赋役资料辑录》一书,点校《两汉博闻》,担任《白话资治通鉴》一书副主编。
- 施 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司马迁研究新论》(合著)、《中国史学简史》、《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维新》等书。
- 魏启鹏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撰有《太平经与东汉医学》、《黄帝四经思想探源》、《马王堆古佚书中的道家与医家》、《帛书〈德行〉校释》、《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等论文。
- 刘 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撰有《区田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北魏末期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等论文。
- 杨世钰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云南省志·地理志·云南省建置沿革》等书,撰有《南诏的统治制度及其特点》、《孟子名本思想浅议》等论文,主编《大理丛书》。
- 谢桂荣 河南大学副研究馆员,撰有《侯方域年谱》、《范仲淹师承问题考辨》、《〈文苑英华〉〈唐文粹〉相互关系考》等论文。
- 夏应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东详编》、《汉文化史纲》(合著)等书,撰有《亚洲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向西太平

洋地区的传播》、《论唐代初期中日韩关系》等多篇论文。

余太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吠哒史研究》、《塞种史研究》等书。

刘宗汉 中华书局编审,撰有《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经脉书研究之一——从帛书经脉书论内经经脉走向体系的二元性》、《颈方彝考释》、《栢比堂析布新考》等论文多篇。

前 言

《史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对于汉代以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推誉《史记》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也有相类似的评价,他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说:“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那是再精辟不过了,他于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是“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而赅的评断,揭明了《史记》的特殊地位。

《史记》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史学家之手。他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在孩童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开始学习古文。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遗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使司马迁开阔了胸怀,增长了知识,为尔后撰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结束漫游,返回长安后,出任郎中。郎中虽然位卑秩低,但却是步入仕途的阶梯,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元鼎年间,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封禅,司马迁常为扈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活动,使司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这就是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知识渊博,撰有《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派别进行了总结。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以顽强的毅力、喷薄的激情完成《史记》,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从此,他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便开始撰写《史记》,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的“论次其文”。在撰写过程中,横祸降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因孤军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围,全军倾覆,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就此事询问司马迁,他怀以拳拳之忠,坦陈己见,认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敌众,又无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下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身陷囹圄,受了腐刑。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挺身救助。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痛不欲生。但他顾念《史记》还没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来。这次腐刑之祸,对司马迁灵魂的撞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撰写《史记》的动力和境界,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异于往昔的阶段。

三年后,司马迁被赦出狱,担任中书令,成为皇帝身边的秘书,看似荣耀。但这一官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表面上的荣耀,遮掩不住实际上的耻辱。司马迁与命运抗争着,终于超越了自我,把血与泪全部凝结在《史记》之中。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他回了一封信,即有名的《报任安书》。其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看来这时《史记》已经基本写就。

司马迁去世年代,尚无定论。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很难指出确切年代。大体说来,应该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

据《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名“太史公书”。早期,学术界也把《史记》称作“太史公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三国时期,“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由五个部分组成,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内容主要记述帝王言行政

迹,兼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国家大事。实际上,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可视为全书的纲要。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记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等于诸侯的本纪。个别人物,如孔子、陈涉,虽非王侯,但其行事和影响却与一般人臣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张守节《史记·孔子世家正义》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司马贞《史记·陈涉世家索隐》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两家的诠释符合实际情况。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上层勋臣士大夫,下层某领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传。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撰有专传。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礼乐、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

《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不是毫无联系的,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全书的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立足本纪去阅读世家、列传,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传去阅读本纪,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书则不同,它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专题,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几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画面。

在《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体裁称之为“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编写了大量的纪传体史书,名声最著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中《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二十三史和晚出的《清史稿》,虽然在体制上与《史记》不完全相同,如《汉书》无世家,书改称志,一些史既无世家,也无表、书。但是,诸史却无一例外的有纪有传,均未超出司马迁创设的体制。由于纪传体史书体制宏大,可以分门别类地容纳历朝的典制,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真实地反映上下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特别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成为各朝“正史”。《隋书·经籍志序》说: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到清乾隆年间,钦定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为“正史”。纪传体史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各体史书所无法比拟的。

《史记》记事的上限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下限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两种说法赞同者多,一说终于武帝获麟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一说终于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武帝时期,历时三千年左右。司

马迁把如此之长的历史载之于《史记》，从而使《史记》成为贯穿古今的通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司马迁之前，也出现过不少史作，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秦记》、《楚汉春秋》等，都是不同时代的史学代表作。但这些史书都不具备古今通史的性质，在时代空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文化勃兴。奋发昂扬的时代气息，给司马迁撰写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汉兴秦亡，原因何在，对于当时的史学家来说，是一个迫切需要总结的问题。再往上追溯，历代的兴亡，都需要思索，寻找出规律，作为汉代统治者为政的借鉴。司马迁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和时代呼唤下，完成了他的史作，从远古，到当代，悠远而恢弘，体现了汉武时期的辉煌。

史书是叙述史事的，编撰一部优秀的史书必须拥有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经过剪裁加工，才能熔铸成材料丰富、信而有征的史作。在这一方面，司马迁不愧为史学巨匠。他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取材相当广泛。在《史记》一书中，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余种。当然，司马迁披阅的典籍远不止此数。《汉书·司马迁传赞》提到的司马迁修《史记》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仅这五种书，就有《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三种在《史记》中没有言及。由此可以推知，司马迁占有的史籍该有多么宏博。除了史籍，司马迁还利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书。他身为太史令，管理档案文书是其所职，阅览和利用这些档案文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史记》中有关汉诸侯、功臣诸表，均取材于国家收藏的《功令》、《列封》、《令甲》，舍此而别无他途。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也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这些材料范围颇广，有对地理的勘察，有对古迹的调查，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有对当事人的访察，有对歌谣里语的搜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史记》的取材范围。

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义例”，进行材料的选取和组织。所谓“义例”，又谓之“书法”、“凡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从《史记》本身来寻找，可以把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第一，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明确地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而“六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的准绳。所以《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基于这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或者采录，或者扬弃；另一方面，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经过剪裁，直接熔铸于许多篇章。第二，信从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

件发生的时代,记事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这就相对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所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此类典籍,产生的时代较早,是司马迁撰修《史记》重点取材范围。有代表性的是古文《尚书》,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习此书,修史时采摘颇多,如果我们把《尧典》与《五帝本纪》、《禹贡》与《夏本纪》、《金縢》与《鲁周公世家》、《微子》《洪范》与《宋微子世家》略作比勘,就会发现司马迁由衷地相信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外,对古文书写的《诗》、《春秋》、《左传》、《国语》等典籍,也多有采录。第三,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游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大量纳入《史记》。如《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人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和可信。第四,“择其言尤雅者”。意思是说选择记述可靠的。司马迁得到的材料,百家杂陈,众说纷纭。面对这些材料,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了“择其言尤雅者”的选材原则。他对同一人物、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黄帝的记载。从战国至汉初,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各家著作,没有不大谈黄帝的。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荒诞不经,用司马迁的话来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治史精神,他“择其言尤雅者”,只撷取《五帝德》、《帝系姓》中较为可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因而赢得了后人的推誉。清代李嗣业《杲堂诗抄》卷四便说:“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夸。”第五,疑难之处,或存疑,或略而不书。由于各种原因,史料歧异,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本是正常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难免不失之武断。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提出“疑则传疑”,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又提出“疑者阙焉”,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标年月,只载世系,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最好体现。在取舍材料方面,司马迁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原则,如《大宛列传赞》提出“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天官书》提出“纪异不说不书”,等等。司马迁根据这些原则,取其所当取,弃其所当弃,最后结晶为一百三十篇。

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人们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可以看出撰写《史记》的宗旨。

“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人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中心的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鼓的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由于前人唯物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科学探讨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却是站在思想理论界的峰巅。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没有彻底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看到司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有时，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这种对宗教神学的怀疑与信从、否定与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印。

“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古今历史的变化。历史是凝滞不变的，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承认历史的可变性，所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其内容略古详今，粗线条的勾勒夏、商、周，而对战国、秦、汉历史则条分缕析。他通过“原始察终”，来“见盛见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做到以古为镜。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洞察力，对历史的把握和运用，已经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没有摒弃机械循环论的影响，但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权威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相对比，还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独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宏伟志愿和博大胸怀，也看到了他敢于从事开创性劳动的个性。在司马迁之前，史学还谈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书，尚难目为“一家之言”，史学被包容在《六经》之中。是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采摘《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融会各家学说，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首次运用纪传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国通史，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的变迁，谈古论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术门类，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竖立起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从此以后，史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新阶段。

《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亲手抄写正本、副本两种,“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太史公自序》语)《索隐》把“名山”解释为“书府”,又引《穆天子传》和郭璞之说,进一步说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即国家图书馆档案馆。把《史记》献给中央朝廷,可能性不大,《高祖本纪》有对刘邦的讥讽文字,《今上本纪》对武帝尤多微词,献书朝廷,弄不好便会招致不测之祸。何况“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处,那么,岂不正本在京师,副本也在京师?从行文来看,“名山”与“京师”应当不是一地。《史记》的副本也没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马迁之婿杨敞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丞相,他曾让《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敞子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并把全书宣布于世。但是,西汉末年,《史记》仍不易得到。《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时值成帝之初。当时连诸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记》,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东汉初期,《史记》的流传仍局限在上层,人们得到的是一些单篇抄本。皇帝把个别篇章赐给臣下,都是有针对性的,被朝廷上下视为一种特殊的恩宠。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史记》才在文化界较为广泛地流传,进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据司马迁所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但是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史记》有残缺。《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之言云:“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司马迁传》载固之言,也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下载班固自注云:“十篇有录无书。”班彪、班固父子治学严谨,又去司马迁仅百年左右,他们所言不会有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出十篇篇名。后来,三国时魏人张晏开列了所亡十篇篇目,《集解》引张晏云:“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研究《史记》亡篇的学者,有的支持张晏的说法,也有不少人持有异议。众说纷纭,互相驳难。由于缺乏绝对可靠的材料,很难定论。大体说来,在班氏父子时代,《史记》残缺十篇,残缺程度不一,既有整篇,也有部分章节。

古代人写书还是比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见惯,缀补别人的撰述也是常事。《史记》出现缺失,便有了增补者,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先生便是其人。《索隐》引张晏云:“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

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除了这四篇，据今本《史记》可以确凿无疑地指出有褚少孙补续文字的篇章还有《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有的学者认为《陈涉世家》标明“褚先生曰”，所以也论定为褚少孙续补之篇。但《集解》引徐广说，古本《史记》“褚先生曰”或作“太史公”，《陈涉世家》是否存在褚少孙补笔，很难得出令人坚信不疑的结论。《张丞相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两篇，也有人怀疑揉入褚少孙笔墨，但同样缺乏确证。

历代出现过不少学者注释《史记》。根据今天能够看到的材料，最早作注的是东汉延笃，他撰《音义》一卷，又有佚名者作《章隐》五卷，均见载于《史记索隐后序》。两家注释之作，早已失传。南朝刘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驷又作《集解》八十卷。《音义》久佚，《集解》尚存，是今世还能见到的最早《史记》注释，为数众多的《音义》片段，保留在《集解》中。南齐时，轻车录事邹诞生撰《音义》三卷，隋秘书监柳顾言撰《音旨》三十卷，邹、柳二家撰著失传已久。进入唐代，注释《史记》的工作受到学者的重视，不但注释者增多，而且出现了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即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裴氏《集解》主要利用儒家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司马氏《索隐》比《集解》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仅注音，还注重释义，音义并重。张守节撰《正义》倾注毕生精力，注音释义都比较严谨，对地理的注释尤为详明，质量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裴氏、司马氏、张氏三家的注释，被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训释之作，人们习惯上合称“三家注”。三家注本来各自单行，宋朝时才把三家注统一排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清人吴国泰撰著《史记解诂》、瞿方梅撰《史记三家注补正》，多有新的阐发。今人日本泷川资言撰著《史记会注考证》、台湾王叔岷撰著《史记斠证》，都是注释《史记》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以前，《史记》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今天尚能见到的都是零散的残卷，日本高山寺藏有六朝时期抄写的《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篇和《史记集解酈生陆贾列传》一卷，国内外藏有为数极少的敦煌唐钞卷子本《史记集解》。能够使《史记》得以广为传布的不是手抄本，而是宋代以后出现的大量木刻本。北宋景祐年间，曾刻《史记集解》，今存四十一卷，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本的祖本是淳化刻本，淳化原刻本已不可得，景祐本就是今世最古老的刻本了。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刻印《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另外又有朱中奉刊本和淮南路无为州官刻本。三家注合刻本以南宋庆元年间黄善夫刻本为最古，此本颇受学术界重视，涵芬楼和商务印书馆都曾影印。清代是整理古籍的辉煌时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流传较广

的刻本,一种是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人们称之为“殿本”。因为是国家一级的官刻本,所以有许多知名学者参加校勘,对《史记》原文和注文多所厘正。另一种是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金陵书局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此本汇校了宋、元、明有代表性的各种版本,并汲取了学者的研究成果。此本失误较少,人们视为善本。五十年代末中华书局开始标点校勘《二十四史》时,《史记》即采用金陵书局本为底本。1959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史记》。这一新的本子,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全书有了标点分段,二是根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对《史记》原文和三家注作了大量的校订工作,给读者提供了方便。

这次对《史记》全书进行注释和翻译,原文是利用金陵书局刻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明显错误之处,注释者作了改正。

本书的注释和翻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稿子是十年前写就的,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及时出版。这次付印之前,注释者又作了一些修订。由于本书成于众人之手,水平不一,不妥和失误之处,实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吴树平

目 录 (上册)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刘起钊 林小安 注译 (1)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刘起钊 注译 (29)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裘锡圭 注译 (71)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李 零 注译 (87)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李 零 注译 (137)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吴树平 吕宗力 注译 (177)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吴树平 吕宗力 注译 (243)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吴树平 吕宗力 注译 (281)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吴树平 吕宗力 注译 (325)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吴树平 吕宗力 注译 (347)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吴树平 吕宗力 注译 (377)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王煦华 注译 (391)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吴树平 注译 (423)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李解民 注译 (455)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缪文远 注译 (641)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骈宇騫 注译 (733)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骈宇騫 注译 (771)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吴树平 注译 (831)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盛冬铃 注译 (917)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盛冬铃 注译 (957)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盛冬铃 注译 (1007)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赵 超 注译 (1043)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1〕}

刘起钎 注译
林小安

黄帝者，^{〔2〕}少典之子，^{〔3〕}姓公孙，^{〔4〕}名曰轩辕。^{〔5〕}生而神灵，^{〔6〕}弱而能言，^{〔7〕}幼而徇齐，^{〔8〕}长而敦敏，^{〔9〕}成而聪明。^{〔10〕}

【注释】〔1〕《五帝本纪》，本篇是司马迁对我国夏代以前先民历史的概述。迄今为止，我们对古人盛传的夏代的认识，仍然停留在零星的传说上。目前，我国的考古工作者正在根据古代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带晋南、豫西，寻找揭示夏人社会面貌的遗址、遗物。在未获得足够的实证之前，对夏代的历史尚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传说在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同样如此。人们把人类有确切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我国史学家则把没有确切文字记载，而由口耳传说构成的历史，称为“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五帝本纪》记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历史。司马迁在本篇中的记述，前三帝黄帝、颛顼、帝喾，全据《五帝德》（载于《大戴礼记》），补充以《帝系》（司马迁称为《帝系姓》，出《世本》，亦载于《大戴礼记》）；后二帝唐尧、虞舜全据《尚书·尧典》，都是照抄原文，《尧典》之外，再补充以《帝系》、《五帝德》之说及《世本》。这里所称的

“帝”是后世的称呼，当时中国尚处在氏族社会，所谓“五帝”不过是部落联盟首领中的佼佼者。这个时期，氏族如林，每个氏族及其联盟都有自己漫长的发展史。他们在各自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总有种种的发明和创造，同时，经常出现氏族间的生存斗争。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往古史迹在传说过程中，常把不同人、不同时期的事迹归集到少数神话化了的人物身上。在古代传说中，古帝名本来是很多的。但是，自从战国后期流行五行说以后，什么都要配成“五”，于是就要在许多古帝中拉出“五个”来抵充“五帝”，因而先后出现过四种“五帝”说：第一，前期五帝说。此说五帝为黄帝、颛顼、喾、尧、舜。今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吕氏春秋·古乐》、《尊师》、《史记》。最早《国语·鲁语》载此五帝资料，唯未明称“五帝”。第二，后期五帝说。此说五帝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今见于《战国策·赵策》、《易·系辞》、《庄子·缮性》、《淮南子·俶真》、《三统历》。第三，战国末提出的五帝说。此说五帝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今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时则训》。第四，汉、晋编定五帝说。此说五帝为少昊、颛顼、喾、尧、舜。今见于《世经》、伪《孔安国古文尚书序》，自晋皇甫谧